

域 外 ·

全球化与大学质量改进

——全球化对大学服务质量和组织的影响

阿瑞德·特捷达夫¹ 文·罗丹²,高晓杰² 译

(1. 挪威奥斯陆大学,挪威;2. 厦门大学高教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全球化浪潮是怎样影响第三级教育的组织、管理、科研以及教学质量的呢?全球化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的蓄谋”,也就是一个为组建“有效的世界”的有意识行为,同样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中立的构架,作为分析全球化对文化、经济和技术影响的一个参考。在提出“中国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疑问时,我们是基于一个西方参考框架来分析大学发展的。

关键词:全球化; 大学质量; 改进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59(2004)03-0060-06

Globalization and University Quality Improvement :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University Service Quality and Organization

Arild Tjeldvoll¹, LUO Dan², GAO Xiao-jie²

(1. Oslo University, Norway; 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 How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affects th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tertiary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greedy capitalistic premeditation”, or a conscious behavior to organize “an effective world”, also can be understood as a adiphorous structure as one of the reference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globalization to the culture, economy and technology. We are in a western reference structure to analyze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when we present the doubt about “whether china is facing the similar problem”.

Key words :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quality, improvement.

一、全球化对西方大学服务质量和组织的影响

在所谓的全球化之下,西方大学质量发展中最关键的概念和最大的争议是什么?中国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西方,全球化是一个在各个领域都备受争议的词汇,但在分析大学发展时似乎又无法绕过它。暂且撇开它的字面意义和对它的一些经验理解,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现实,它是,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相当残酷的高教发展大环境。全球化被认为将对大学主要职能——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产生深刻的影响,或者教学将被重新定义为在大众化高教机构中人们组织学习的方式。

同样,质量的概念也是充满争议的。什么才是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的质量呢?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将决定大学发展战略和目标的确立。从投资者的角度

出发,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教育部(也有的是劳动部)、工人、学生和教授对大学服务的质量各自有着不同的见解,——因为他们的思想各异。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对价值和目标的追求也不相同,并且在大学中有着不同的投资利益。事实上,谁将优先决定大学的质量标准呢?从全球范围来说,在国家、教授和市场之间正发生着一场有趣的权力争夺。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国家财政状况,在不同国家中这三者的平衡也是不一样的。

(一) 学术研究

学术知识是研究型大学之所以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关键特征。研究是一个有力的词汇,它既能指任何事物,又可能什么都不包括。一个电视节目可以是基于“研究”,日常问题的调查也可以称为研究,但大多数人仍习惯于将它理解为学术或科学研究,即以寻找令人

信服的真理为目的的活动。

研究报告(不仅是教育领域),都常常关心事情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它们应该怎样去实施。这是规范的或实践的思维方式。这看起来公平十足,但是研究者通常也对什么是最好的或最有效的有先入为主的理解,这就势必影响到研究的可靠性。与这种调查不同,分析的研究思维方式倾向于在一个独特的科学参照框架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探讨和解释某一现象,这样其结论将更加可靠和可信。

在研究大学质量方面我们应该清楚是何种思维方式在指引着我们的行为:是我们能观察到的事实?是自己潜意识中希望看到的事物?还是一种发现的动机——看看我们能怎样让事情发生?我们的研究行为是被分析的、实践的,还是标准的思维方式所引导,将导致对大学发展的研究出现本质的差异。学术研究者一般都十分重视这些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别,并为选择研究方法提出建议,以保证研究方法的正确使用和研究结论的基本可靠。但是随着高教大众化的发展,一些教授却在用他们政治上的偏见影响着严肃的学术研究。

(二) 质量

现在,质量一词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但我们却很难找到关于质量的较好定义,通常的理解是质量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当你接触到质量时,你就知道质量是什么。”称质量是与个人主观相关或者是植根于社会文化是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因为大学在西方国家中是一个植根于文明社会的代表特定价值体系的组织(它与教堂、家庭一样是文明社会的奠基石),所以,质量问题在大学研究中就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质量可以与马克思·韦伯对价值目标和工具目标的区分相联系。价值目标是根本的被广泛接受的质量特征,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准则。工具目标是相对于经济和实用问题的,它通常为价值目标所决定。例如:对一所大学来讲,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十分重要的,但经济支持是为了招聘到优秀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进行研究并敢于对像国家和市场这样的权威说实话。质量在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的含义可以被进一步表达为:“以研究和学习为目的”的质量和“为研究和学习的目的服务”的质量。

1、“以研究和学习为目的”的质量观

质量可能是与为达到某个给定目的所选择的工具、目标或战略的适用性有关。以大学招生为例:当教师的教学组织方式帮助学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时,学校的招生就必然增多。这时,教学作为提高该所大学招生竞争力的工具就是高质量的。这一工具性的“以教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质量观一般与效率、效益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

成就越高就表明教师的教学质量越高。因为他们以较低的花费培养出了市场竞争力很强的学生。

2、“为研究和学习的目的服务”的质量观

“为研究和学习的目的服务”的质量观与工具性无关,它所关心的只是研究和学习目的本身的质量。我们的目的确实是有价值的吗?我们利用高科技手段所竭力想实现的那个目标是否真的有意义?与关注工具的质量不同,在这一质量观下人们更关心的是所做事情本身的意义以及从价值的或道德的角度出发所追求的目的是否真的重要。教育质量可以作为一例:即教育的根本意义是提高学生的工作竞争力吗?还是应该与训练学生成为负责的个体,帮助他们在文明社会中的自我发展有关?

3、两种质量观之间的论争

在当前西方高教领域,对这两种质量观有着激烈的争论。政府(教育部)、大多数学生和工人们更关注高教在提高人们持续竞争力方面的作为。因为持续提高相关能力已经成为个体或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生存的必要。支持这一观点的阵营中流行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学习或者毁灭”。

“为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服务”的质量观阵营以教授和知识分子为代表。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不论思想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宣称,以学习和研究作为目的质量观的成功将付出学习和科研的真正目的为代价,即以付出大学这一社会文化机构的经典价值或目的为代价。他们呼吁,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全部的目的应该是:从事基础研究和训练学生成为有创造性的、独立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此外大学的另一重要目的应该是训练年轻人向权威说“不”——以与不人道的、一边倒的经济工具主义抗衡。

综上所述,大学质量发展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显然是:是否可能组织一种大学既能传承人类文化价值体系又能同时满足经济发展这一人类生存基础的需要?此外,如果这样的大学存在,它又如何能在相关的大学组织和研究、学习行为中设计这一双重目标?如果玩一个文字游戏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在高质量地实现这一双重目的的过程中我们所采用的手段的质量又将意味着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一些利益相关者将倾向于大学职能的分工。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将主要进行为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服务而开展的研究和学习,而一些职业性大学则主要贯彻以科研和学习为目的的教学。但是,另一些人指责这种划分将暗示着高教领域的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结构的诞生——它处于文化教养和工具性训练之间。这一“不平等”将难以被有着强烈民主意识的社会所接受。但是,也许大多数学生并不会对成为教

育的目的感兴趣,也许他们更愿意以得到高质量的、利润可观的工作为目的,也许在大众化时代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有人保持传统的理想化的目的已经不可能,市场将拒绝这些。在挪威,学术精英主义目的、社会平等目的和保持高校全球化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三) 全球化

全球化同样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甚至要求人们对它有一个大致的共识也比较困难。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至少有三种:一种观点将全球化视为“贪婪的资本主义的蓄谋”,法国的“攻击”行动组织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佐证。国际性政府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大型跨国公司都被视为寻求全球利益的推动者,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不公平并引起社会风气恶化。所以,全球化应该受到责难甚至停止。在雅加图、热那亚等地举行WTO会谈时遭遇的示威游行就是坚实的证据。第二种观点对全球化持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进程,并且是使世界生产和分配更有效的一种建设性方法。通讯技术的革命和市场经济思维的成功,使得将世界视为“地球村”的意识成为对每个人生存的一种挑战。第三种观点对全球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试图分析全球化,竭力使全球化过程变得有概念,然后去收集经验性的数据来支持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三部曲正是一个证明。像卡斯特尔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并未对全球化持赞同或是反对的态度,他们所想做的是先尽力去理解世界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二步是希望能预测社会、文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从这一分析出发,政客们就可以为选择政策提出不偏不倚的建议。如果一个高教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高教研究的话,他所有的疑问将是:“如何使这一既包含经济又包含文化的理论在传统的西方研究型大学中变得合理化?”对当前大学行为的研究如对剑桥和墨尔本的研究就为解决传统精英型研究大学如何在管理、研究和教学方面适应全球化时代提供了有趣的观点。他们像成功的商业性大学一样运作,但是他们能够成功吗?或者它们会不会转变成为对价值毫无意识的“知识工厂”——只知道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

1、全球化对大学服务质量的影响

无论象牙塔中的教授们如何阻止全球化的推进,全球所有的大学几乎都在被迫进行组织和生产的变革。他们被迫变得更加富有竞争力,以争取学生和获得研究资助。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实力不同,政府、教授和商业机构之间的权利传统也各不相同,这一挑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在那些将高教视作其经

济发展决定力量的国家,对大学的改革力度是很大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就是这样。另一些国家在这一挑战面前则显得相对悠闲,用大量的时间来讨论是否需要改革以及需要怎样的改革,这是那些有教授治校传统或是经济实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前者如德国,后者如挪威。

2、西方大学面临的挑战预测

对研究而言挑战是双重的,既有对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挑战,也有对与国家和市场高度相关的应用科学研究的挑战。前者意味着要有一个公共系统能保证对优秀科学家的独立研究进行长期投资;后者意味着要有科学家从事顾客所需要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并且由他们的顾客付酬。这双重挑战如何协调一般取决于一个国家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间权力的角逐和平衡,以及政府政治策略的技巧性。就教学而言,对大学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教授成为教师——为高度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创造真正的学习。这是一个难度十分高的挑战,因为许多教授尽管精通研究却穷于教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不愿意学习教学艺术以适应学生群体普遍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许多教育研究者也许已经意识到最根本的挑战是要将整个大学视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怎样使它的机构、进程和功能设计得适合教授、管理人员以及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以避免“毁灭(被淘汰)”。如果学生认为一所大学的教学不够好,他们可以用脚投票。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更重要的是治理、管理以及行政的质量。在挪威,这已经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在阻止政府将挪威的知识产品和第三级教育变的更有效和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方面,数以千计的教授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七十年代一个激进的学生。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挪威是一个教授和商业组织有效抵御全球化对大学影响的极端例子。抵抗运动获得相对成功的一个特别原因是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在挪威,收取远程学生学费是一个荒唐的词语。另一个原因是大学管理者、商业组织以及教授三者之间为了保护其自治和职业稳定结成了坚实的联盟。

全球化对研究、学习组织方式以及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管理设计方面的近期影响,似乎从观察美国 and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就足以反映出来。从历史侵袭而来的不同标准看起来正在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融合。一般而言,这两个世界在将大学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方面都有唯理性主义倾向。而许多欧洲国家仍然将大学视为由理想主义精神主导着的,与国家和市场经济利益保持一定距离的象牙塔。它还保留着大学自治的传统,由教授们决定大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在挪威这

样的国家,象牙塔模式的长处也变得对国家学术和大学管理人员具有战略意义了。是大学教授(包括大学和学院所有的副教授、助教)和学院管理者之间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具体化为阻止挪威政府质量改革的行为呢?应该是在没有对其机构的经济利益给予足够考虑的情况下,以学术自由的名义要求得到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持续照顾,这样的联盟视角就显得相当有趣了。

挪威高等教育也许只能算是西方高教发展的一个特例——一个高教海龟在快速发展的美国大学模式的相同方向缓慢行进。中国也许是逐渐减少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一个特例。尽管这一阵营国家并不多,但中国却拥有世界30%的人口。然而,这一比较中的关键问题却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真的与西方高教迥异吗?

二、中国是否真的不同?

在国际比较高教视野中,中国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国家个案。本文的分析基础是基于经验的,也是十分有限的。

(一) 全球化——不是一个问题?

在英美国家,WTO提案中将教育产品作为可以在全球市场中自由交易的规定,和由此所产生的大量的营利性高教机构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在中国很少能听到关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言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加入世贸,并且似乎人人都认为这是对中国绝对有好处的事情。而对于“高等教育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这一问题以及它可能对中国高教的目标和内容带来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一个最主要的印象是中国对其高教的国际竞争力有着充分的自信。

西方大学在中国分支机构的出现可能仅仅被视作对中国国内教育的一个有效补充,对于数十亿只懂汉语的人们来说,它永远不可能构成对中国大众化教育的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似乎更愿意去选择、应用任何已经出现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实用价值的西方高教思想和产品。

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可以尝试着归纳为:由于其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国对全球化是欢迎的,而且是自信的。他们自信能够在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的胜利。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可以看作是其国家发展策略的一个晴雨表,国外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将只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二) “中国式的”研究范式

在与中国研究生的讨论中,我强烈地感到有一个与国际或称西方范式截然不同的中国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种,在第一种方法中,你将发现下列步骤:(1)问题

陈述(与西方研究范式对应)——这一步不是必须的,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已经知道你的文章讨论的主要问题了;(2)作者的主要观点陈述——文章的核心,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宣扬他或她的观点;(3)结论——不一定要单独列出,一般而言,他们可以包含在第二步中。

第二种方法有四个步骤:(1)陈述问题;(2)作者介绍自己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作者选择的方法是文章的核心;(3)逻辑检验所选择的主要研究方法;(4)得出结论。

他们认为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和自然科学研究相同的实证方法,比如将经验的数据看作决定性的。这种方法在中国的研究范式中是第二位的。中西方研究范式的第二个不同是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方面。西方研究中对前人的研究(文献综述)十分重视,新的观点必须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且是对前人研究的突破(而不是重复别人已经有的发现)。但在中国的研究范式中,这些似乎不是必要的。研究者也会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一定认为他们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更重视考察作者本人的观点。尽管中国的研究者正在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视为一个国际潮流,但中国的研究方法在这些学者中仍然十分盛行。然而,对这些争论作一个更细致的观察并以比较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的研究,人们会疑惑:这两种范式之间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中国的研究范式与人们所熟悉的西方反实证研究的批评并无多大区别,根据韦尔奇的观点,西方对实证研究范式的批评已经相当厉害并导致了一个一直被理解并应用着的科研“法则”的毁灭。因此,如此严格地区分中西方研究范式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什么是科学的研究这一问题与研究质量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与前面所讨论的根据韦伯的价值目的和工具目的所划分的“以研究和教学为目的”的质量观和“为了研究和教学的质量观”紧密相关。

(三) 质量问题不只是中国才有的争论

对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应用作一个历史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对社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有一个纯粹理性主义的理解,这和西方的理想主义视角截然不同,尤其是与德国洪堡的大学理想相去甚远。中国历史上,是皇帝和达官贵人们决定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职能,它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满足国家的理性需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是从价值(共产主义者理解为民主)和功用的双重国家利益出发,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大学规程仍然是强调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从教育和知识的产品明显是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服务的角度而言,中国的教育质量同样存在着“以教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质量观”。比较过程中的一个矛

盾也许是这样:西方同样也是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但是现在并不是从国家(比如社会福利)的需要出发,而是从残酷的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出发。而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从国家需要出发采用纯粹理性的理念。但是中国却给世人展示了一个国家理性主义的特别模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这个国家将其理性主义扩展到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了。

(四) 中国高教面临的未来挑战凝思

面对西方、英美国为首的高教和全球化、市场化的影响,设想一下中国高教的将来,它面临诸多挑战。

1、科学的“双语化”

尽管从传统的和感情的角度出发,大多数的中国学者还是更倾向于中国的研究范式,但掌握国际主流的经验研究范式已经明显成为必要了。因为这是有效国际交流的必要,同样也是提高中国高教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由此出发,中国的学者们也许应该走向学术的双语主义——即同时掌握中西方两种研究范式,并且能运用两种范式进行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从能力的角度出发,这些学者们应该能够在这两种范式之间进行持续的评价和取舍,以决定什么情况下应该采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什么情况下应该选择本国的。

2、大众化时代的“大学教学方法问题”

尽管中国大学仍然在扩招,但其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中国的学生们进入大学学习的愿望十分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掌握教学方法的动力和以此作为吸引学生入学的必要。而西方国家这点已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由于大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学生群体也日益多样,学生学业认知背景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更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和应用互动学习方式也将成为必要。从技术视角而言,大众化时代的大学教学法就是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包括校内和校外。国际高教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迫使中国教授们改革其教学方法。

3、国际性学生的地位和角色

全球化和高教市场经济的形成将刺激国家之间学生交换的增多,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学生去国外继续自己的学业。与学术双语现象相同,中国学生将发现掌握不同的学生角色也是很有好处的。中国学生的角色与西方学生有着很大的差别。为了充分利用留学机会进行学习,熟悉留学环境中的学生角色并具有尽量扮演这一角色的能力是十分有用的。另一方面,一回到中国,又要能恢复中国学生的角色。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迅速熟悉自己的角色并获得教授的青睐都十分重要,掌握两种角色并让他们和谐自然地替换而不至于产生个性分裂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挑战。

4、文化防卫的需要

尽管仍然是基于很少的经验性的数据,还有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一些老教授表达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明显担心。这一文化冲击包括对语言、艺术的冲击以及近来对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的影响。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再返回中国时,他们不仅仅是使美国的流行文化商业化,而是或多或少地被西方重新社会化了。面对这一情况,中国的文化防卫工作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此外,当世贸组织关于教育开放的规则通过之后,美国大学在中国大陆的分校逐渐增多,除了在教育、语言和计算机技术等的竞争之外还有着什么样的竞争?他们是否也会带给中国人思想和灵魂?老教授的这些疑问表现出一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担心和恐惧,这使人们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受西方入侵的中国(如鸦片战争)。显然,这些是十分认真的担心,在制订国家高等教育和文化政策时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的讨论。

但是,一个更为自信的态度是还不需要考虑文化防卫这一问题。中华文明是如此悠久和强大,又有着语言这道“防火墙”,尤其是将它与国外资本主义向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进军联系起来时,似乎应该是老外们学习中文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从这个观点出发,是中国人将改变西方文化而不是相反。或者,发展也许会像卡斯特所宣称的那样:“文化的传统意义将消失,剩下的将只是一个暂时的文化规则。”

中国的老年人所表达的一个独特的文化防卫需要,是指保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尽管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毛泽东的错误,人们还强烈地坚守着集体负责、平等和尊重全人类等理念。邓小平理论是邓个人思想和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集结,基本上是邓小平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察和思考总结,它包含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等重大措施。他的农业生产现代化理论、利用技术更新和管理改革改造工业的思想以及放开价格,鼓励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扶植私营企业等举措都被证明在搞活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是成功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避免被贪婪的、全球化的、非人格的资本主义所吞并吗?

(五) 总结:中国已经找到了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的“成功模式”吗?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起来像一个相互矛盾的词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确实是一个既能保证社会公正,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新发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高等教育在这一经济模式中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根据卡斯特尔的观点,“如果知识是新的国际信息经济的电能,那么大学就是所有新发展和进步必须依赖的发电站。”他还论证了组织第三级教育的两种方法:一是创建有特定目标的大学机构,另一种是在无限扩大的商业目的框架内实现。后者在西方被称为“企业大学”。

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度,政府对公、私立大学甚至是两者组合产生的更灵活的新型大学的政策,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种功能。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对第三级教育的组织、管理和资助模式进行多样化的改革尝试。

西方关于高等教育“以教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质量观和“为了教学和科研的目的”的质量观之争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下,在当前的国家组织和管理哲学中,这样两种质量观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有效的统一和整合。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广义上说,既是为这个国家根本的文化价值体系服务的,也是为其从地方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经济体系服务的。如果这一双重服务能很好实现,中国就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国家治理模式,高教自然包括在内。确实,中国的高教组织方式和西方国家是迥异的,这个国家也在继续控制着世界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对中国社会平等观念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Harvey L. & Green, D (1993) :“Defining Quality”.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Vol. 18, No. 4, 1993

[2] Welle-Strand, A. (2000) “ Knowledge Production, Service and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Tensions in Norway ”in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Volume 6. 3

[3] Weber, M (1964)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lated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4] Welle-Strand, A. & A. Tjeldvoll (2002) ICT, learning & value Creation strategies Missing? Research Report 6/2002. Sandvika: Norwegian School of Management BI

[5] Tjeldvoll, A. & I. S. Holmesland (Eds.). (1997).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Essays on Quality of Equality. Report nr. 10. Oslo: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Oslo

[6] Castell, 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Volume 2: The Power of Identity. (1998). Volume 3: Towards the Millennium (1999).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The information Age: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1996, 1998, 1999)

[7] Currie and Tjeldvoll (2001)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Universities — A Trends Repor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slo.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7).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Institution for Research.

[8] Clark, B. R. (Ed.) (1993) 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Education. Germany, British, France, United States, Japa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9] Altbach, P. G. (2000) The Changing Academic Workpla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ost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9]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Facts about Norwegian education. Oslo: ODIN Government's homepage (<http://odin.dep.no/kuf/norsk/p772/index.nra.html>)

[10] Thune, T. & Welle-Strand, A. (2001) :“ Reorganising resources for independent learning: libraries becoming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 In The New Review of Libraries and Lifelong Learning, Vol. 2, 2001, Taylor Granham Publishing

[11] Jongbloed, B., P. Massen & G. Neave (1999). From the Eye of the Storm. Higher Education's Changing Institu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2] Altbach, P. G., R. O. Berdahi & P. Gumport (1997)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Boston: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3] Leisyte, L. (2002)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Post-Soviet Lithuan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ume 10).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14] Clark, B. (1998).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Oxford: Pergamon

[15] “The Servic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of Europe” in Dewatripont, M., Thys-Clement, L. Winklin (2002) (Eds.) European Universities: Change and Convergence? Bruxelles: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F. Thys-Clement, L. Winklin (2002) (Eds.) European Universities: Change and Convergence? Bruxelles: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16] Tjeldvoll, A. (2001) “Professorene, staten og markedet” (The Professors,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chronicle in Norwegian Daily Aftenposten, Oslo, June 12, 2001

[17] Editorial: Wag the dog: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s two faces, in Forskerforum Tidsskrift for Norsk Forskerforbund (Research forum Journal for Norwegian Researchers's Association) No. 8, 2003 (<http://www.forskerforbundet.no>)

[18] Clark, B. (1998). Creatio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Oxford: Pergamon

[19] Tjeldvoll, A. (1998) “The Idea of the Service Un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13, 1998. Boston: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 Altbach, P. G. (2001) “Higher Education gone Amok?” (Title uncertain),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r 23. Boston: Boston College's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1] 周仲高 (2003) “On Chinese and Western Research Paradigms” Paper to the “English Seminar” on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2003/2004

[22] Welch, A. (1998) The end of certainty?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2, pp. 1-14

[23] Wang, J. (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7th edition, US: Prentice Hall

[24] Castells, M. (1994: 16) “The University System: Engine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Economy. In: Revit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edited by Salmi J. & A. M. Verspoor

[25] Brown, B. (2003) Magic Army.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李亦秋)

收稿日期:2004-02-20

作者简介:阿瑞德·特捷达夫(Arild Tjeldvoll),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高晓杰,罗丹,厦门大学高教所研究生。